

中国人的乱世官场术

曾国藩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

做大官做大事的秘密

人称“中国近代化之父”

京城为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功高震主，全身而退的艺术

曾氏官学

曾氏官学

中国人的乱世官场术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永林

封面设计：亚晖

曾氏官学——中国人的乱世官场术

唐汉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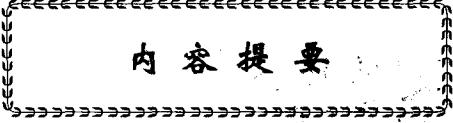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1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1339-1/C · 1

定价：18.80 元

 内 容 提 要

曾国藩是清朝末期的第一名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官场偶像，他的赫赫战功和严以律己的精神，对后世学者和政治家产生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蒋介石曾经对曾国藩备加赞赏，孙中山、章太炎则贬斥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后人毁誉相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谜”一样的人物。

目前，关于曾国藩的专著已经很多，曾国藩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真相。但是，就曾国藩的官场权术和为官思想来说，至今还没有一本象样的专著，本书正是要填补这一空白，系统地探讨曾国藩的为官思想和官场生涯。

曾国藩从少年得志到官运享通，他的个人素质和时代背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转战疆场时，他一方面要与太平军作战，还要一方面对付来自朝廷的猜忌与怀疑，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好都可能杀身取祸。由于曾国藩

完美地处理好了这两件事，才终于能够镇压了太平天国。然而，功成之后清廷的猜忌更甚，完全靠了他的奇计巧谋和小心谨慎才全身而退。虽然晚景凄凉、抑郁而亡却仍然完整地实现了中国人“善始善终”的传统思想。

“做官难，做大官更难”，从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这一点。曾国藩的做官艺术无论在和平时期和战乱时期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本书里，读者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的做官艺术和为官思想的精髓，从律己、忍让、选贤任能、审时度势等多个方面学到做官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了解一个善于做官的人在各种复杂的形势下所应该采取的立场、手段，从而更好地做清官，审时度势，严以律己，更好地做好官。

=====
目 录
=====

第一章 “誉之为圣相，讞之为元凶”	...

一、毛泽东“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
二、蒋介石说：曾氏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13)
三、“中国近代之父”	(18)
四、《曾国藩家书》影响深远	(26)
第二章 造就一代名臣的坚实根基	(33)
一、特定的时代背景	(34)
二、特殊的家庭背景	(38)
三、少年得志点翰林	(45)
四、良师益友的砥砺	(50)
第三章 京城为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55)

一、京官十年连升十级的奇迹	(56)
二、偷偷物色事业上的伙伴	(61)
三、冒死上书显示耿耿忠心	(67)

第四章 疆场为官，“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73)

一、曾国藩的第二战线	(74)
二、打脱牙，和血吞之	(81)
三、四次自杀未遂	(93)

第五章 为师思想，“名正则言顺， 言顺则事成” (109)

一、杀人如剃头的理论基础	(110)
二、精神教育的重要性	(121)
三、一纸檄文百万兵	(128)

第六章 功高震主，全身而退的艺术 (133) |

一、大清朝权势最大的汉人	(134)
二、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140)
三、功成之时如坐火药桶	(146)
四、裁撤湘军以释清廷之疑	(154)

五、与左宗棠失和内幕	(160)
六、军可裁，官不可不做	(179)
七、刊行《家书》表白心迹	(181)
第七章 晚年不得志，抑郁而亡身.....	(187)
一、剿捻之时曾国藩无兵可用	(188)
二、“天津教案”使其声望一落千丈	(192)
三、李鸿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7)
四、顽强的癖病伴他直到死去	(220)
第八章 人材济济的曾氏幕府	(227)
一、曾氏幕府概况	(228)
二、曾氏评众僚客	(234)
三、曾国藩与胡林翼	(252)
第九章 个性品格与做官	(271)
一、志当存高远	(272)
二、求过与自律	(278)
三、待人谦恕自抑	(285)
四、“拙诚”、“坚忍”	(288)
五、“一生不爱钱”	(293)
六、个性的发展与形式	(302)

七、人格与做官 (308)

第十章 伪善的曾国藩 (323)

一、“好杀”的曾国藩 (324)

二、湘军“兵不如匪” (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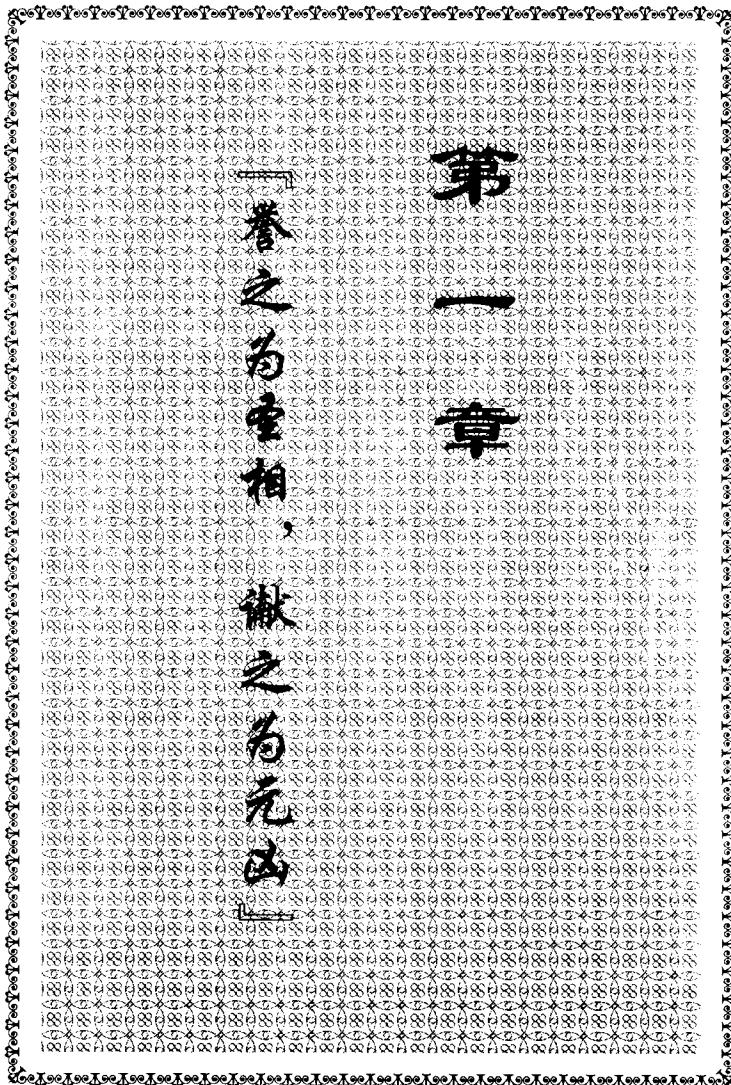
三、为什么非杀李秀成不可? (339)

四、登峰造极的暴行 (352)

五、违朝廷禁律而私下纳妾 (360)

六、礼多必诈与好名必伪 (365)

第
一
章
緒
文



一、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做官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其思想或多或少都受过曾国藩的种种影响。1917年8月28日，毛泽东在给他的老师及朋友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八十年代以后，李锐同志在《毛泽东的早年读书生活》这部专著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鲜明揭示和深刻的研究。后

来又有一些专家作了进一步探讨。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显赫，死后得到了“文正公”这一谥号。清庭称赞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他的赫赫战功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是个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有人说他“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鼎鼎大名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深受这种影响，一时之间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

从毛泽东当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摘录自《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讲堂录》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国藩自视为在军务繁忙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弟弟曾国华战死之后不久，曾国藩特意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除了报告清廷对国华的优恤和介绍战局之外，信中还有这样两节：

“我近来写了一大本书。前边是篆字五个，接着是大楷四十八个，后面是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让纪泽找到这三十二人的遗像画在篆字之后，大楷之前。”

“我生平做事，没有一件成功的，只是对于古人治学的路径已经研究很深，现在在这儿先讲个大概。”

信中说的，就是《圣哲画像记》，言词之间非常得意。文中说：

“书籍实在是太多了，作者之多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之肚子所能装完的，关键在于慎择而已。我知道自己心有余力而不足，就选了古今圣哲三十多人，让儿子纪泽把他们的遗像画下来，藏在家塾里。咱们的后代如果有志读书的话，看这些人的书就行了，不必再看别的书了。”

曾国藩说的 30 多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实为 33 人。曾国

藩将文才与圣德并列，此书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作了论述。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对韩愈、庄子爱不释手。他的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兼顾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对于清朝大儒，特别推崇顾炎武与王念孙。他的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更重视实际去做；追求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仲商鞅之严整；治事则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泛交游，师友非常多，大都学识兼备，可以相互切磋，共同进步。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派而高于桐城派，且善于写诗填词，评论他的人都说曾氏散文堪称清代一流大家。

曾国藩讲究“择书”的观点，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少而精的效果。其中谈到的 33 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

曾国藩的文章，而且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锋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他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毛泽东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廉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 1919 年写的《祭母文》，被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 年的 6 月 25 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对学校特别重视分数的情形作了驳斥。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引用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 12 月 14 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就犯了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良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大错特错了。不过，毛泽东后来对学校功课过多仍力加非议。

曾国藩家书共一千多封，内容极其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家书》各种版本，在旧社会极为流行。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是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

在韶山纪念馆还收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

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更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他的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思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讲堂录》中很清楚地看到，例如：

治军总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这样才能成功
精神越用则越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越苦苦思考则越明，不可因环境不好就中途而废。

“刚”是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他认为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深受曾氏影响。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显然是把曾国藩的一些话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深，以致后来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要阅读

《曾文正公家书》。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办事之人有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传教之人有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朝韩范并称，清朝曾左并称，但是韩左是办事之人，范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所谓办事，是指做出政绩；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做出政绩，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作榜样。

毛泽东在《伦理学》批注中，还引曾国藩日记中的一句话：“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句话今天已成为哲言名句。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